

百种语文

小丛书

曹先擢

主编

汉语新词语与 社会生活

HANYU XINCIYU YU SHEHUI SHENGHUO

陈建民 著



语文出版社

<http://www.ywcbs.com>

百种语文小丛书

HANYU XINCIYU YU SHEHUI SHENGHUO

汉语新词语与社会生活

陈建民 著

YUWEN CHUBANSHE

语文出版社

目 录

一	汉语新词语	(1)
二	新词语创造的时代特征	(15)
三	从华语社区特有的词语看各地的 社会生活	(27)
四	反映社会时尚的新词语	(33)
五	词语政治色彩的退化与社会生活	(38)
六	当前新旧矛盾在新词语中的反映	(40)
七	反腐倡廉中出现的新词语和顺口溜	(44)
八	从当代北京流行语看时代变迁和 北京的人文风貌	(51)
	参考文献	(56)

要了解社会,首先必须了解语言。语言由语音、词汇和语法三个部分所组成。其中,词汇跟社会的关系最为密切,社会中出现了新事物、新概念和新观念,语言中就立刻会有相应的新词语来记载它;旧事物、旧概念和旧观念一旦消失,反映它的词语也会即刻消失或隐退。不同时期的词语常常带有明显的时代特色,它贯串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流行一时,为某个时代所特有。可以说,新词语在反映社会生活和时代变革方面最为直接,最为迅速,最为集中。有人说,新词语是社会生活的一个“窗口”,那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一 汉语新词语

新词语的特点是一个“新”字。这里所说的汉语新词语主要指改革开放以后产生并稳定地使用到现在的词语。1978年以前出现至今仍然使用的词语一般不算新词语,而成为普通词语了;1978年以后出现,只是偶尔见到或“昙花一现”,谈不上“稳定地使用到现在”的词语,这里也不讨论。新词语就是改革开放20年社会生活中广为流传、反映新事物、新概念、新观念的词语(包括新出现的全社会和某年龄层通用的词语,一部分产生了新义的旧词)。下面讨论改革开放以来汉语出现的新词新义新用法。

新词语是新事物、新概念、新观念的反映。改革

开放以后,我国的工作重心已由过去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经济建设的轨道上来,大量反映政治、经济、法律、商贸、科技、文教、日常生活和现代意识等方面的新词语不断产生。例如:“中国特色、一国两制、多党合作、参政议政、廉政建设、依法治国、反腐倡廉、法人、平反、引进、外资、经济特区、政企分开、国有企业、第三产业、乡镇企业、小康、市场经济、知识经济、宏观调控、转换机制、软着陆、下海、股票、倒爷、大款、白领、外来妹、保税区、炒鱿鱼、购物中心、连锁店、商品房、承包户、回扣、打假、研讨、社区文化、素质教育、希望工程、电脑、微波炉、宇宙飞船、信息网络、信息公路、彩电、卡拉 OK、迪斯科、文化快餐、休闲、微缩景观、迷你音响、大哥大、港台歌曲、激光唱盘、电子游戏机、空调、防盗门、铝合金门窗、计划生育、性骚扰、婚外恋、年薪、下岗、分流、二人世界”,以及“公关、反思、机遇、认同、奉献、爱心、创意、媒体、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等等。以上是成千上万个新词语中极小的一部分,是这 20 年巨变的时代印记。最近,还出现新词“知本家”(以知识为主要资本的企业家)。信息时代是“知本家”的时代,表明信息时代已展现在我们面前。

新词语反映社会上新旧观念的变化。轻商是中国的传统。历史上关于行业排列的顺序,不管是“士农工商”还是“工农兵学商”,“商”总是排在末尾。

“无商不奸”“见利忘义”“唯利是图”，早就成为古往今来对商人的文化定性。自古文人做官，归隐，投笔从戎，都有许多赞誉之词，惟独书生经商，为世人所不齿。改革开放以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力推动下，人们开始摒弃陈旧观念，增强了商业意识，产生了“无商不富”的新观念。一大批文化、科技界人士纷纷下海，办企业、开公司，做各种买卖，他们眼光，有社会责任感，从事各种商业活动，从而出现了学者式商人；而一些具有经商才干和经验的商人，为了振兴国内商业，提高自己的经商素质，改变商人的固有形象，又以各种形式掺入了文化界和经济界，出现了商人式学者。其中，儒商的出现最引人注目。儒商作为一种社会势力登上历史舞台，可以追溯到明清之际。那时候，社会上出现了一批有良好的职业道德、有事业心、有较高文化水平的商人，即“儒贾”和“贾儒”。但人数不多，还不足以改变人们对商人的传统观念。今天的儒商是贾与儒的结合，商与文的交融，而且人数不算太少。近几年，由于强调搞活流通领域，商的地位有了明显提高，出现了许多带“商”的新词语：商海、商战、商德、商誉、商风、商检、商展、商贸、商场（指商业界）、商亭、商摊、商厦、商业街、商业写字楼、商品房、商品菜、商业广告、文商、房地产商、外商、港商、台商、游商（指流动商贩）等。

近几年来，效益观念取代了单纯的产值观念。

从前,看一个企业的经营状况如何,主要看产值,产值上去了,就证明企业的经营搞好了。现在不同了,看企业的经营状况主要是看其经济效益。每个人的收入都与单位的经济效益挂钩,经济效益已成为投资立项的主要目标,对没有效益的事人们决不会轻易掏钱,提高经济效益已成为大家最为关心的问题。新词语“效益、发挥××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效益工资、效益观念”等频频出现,反映当前人们的效益观念有了明显的提高。

新义的产生也跟社会生活的变化息息相关。新义可以是新词具有的意义,也可以是旧词(即早就存在的普通词语)新产生的意义,这种新义往往具有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取得新义的旧词就兼有新词的某种性质了。新义的产生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

1) 词义的扩大。“下海”在 30 年代出现时指“戏曲界业余演员搭班正式成为职业演员”。1949 年以后,流行在港台的“下海”泛指“女子沦落风尘”,而在内地,“下海”一词就消失了。80 年代末内地再度出现了“下海”,那是指“科技人员离开研究单位自己去办公司,搞实业”,具有“冒风险,赚大钱”的含义。90 年代初,“下海”又引申为“各行各业放弃原来的工作而经营商业”。“下海”新义的产生,反映国内在建立市场经济初期,一些公职人员自愿扔掉了铁饭碗,纷纷走向市场,投身到涌动的商业大潮中去

的社会巨变。

2) 词义的缩小。1996年修订的《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里,把“同志”的第2义项注释为“人们惯用的彼此之间的称呼”。在此之前(例如1976年版)注释为“我国人民之间的称呼”。20年之间社会上出现了许多新的社交称谓,“同志”的使用范围明显地缩小了。“惯用”的措辞比较准确,表明交际双方如果惯用“同志”就用“同志”,惯用“先生、教授、老师、老板、老总、师傅、小姐”,又何必强求非用“同志”不可呢?

3) 词义的改变。“写真”原是汉语词,最初是“画像”的意思。元代,日本从我国借去的“写真”仍指画像。19世纪后,日语“写真”一直是照相、摄影的意思。后来,日语“写真”又引申出“裸照”义。1990年冬,笔者应香港安子介基金会的邀请,以“香港话如何融入普通话”为题在港进行短期调研,发现80年代初香港从日语借入“写真”,既指“照相”,又指“裸照”,“写真集”就是裸照集的意思。80年代中期,“写真”从香港融入内地时仍是“裸照”义。内地禁止宣传“裸照”,含“裸照”义的“写真”便一下子改为“真实写照”和“照相”的意思了。于是,相继出现了“北京写真”“香港写真”“明星写真”“周杰(《还珠格格》里的主演)写真集”,所谓“写真集”,内地是指“个人生活照的影集”。

4) 词义的转移。专用语向通用语靠拢体现出科学文化知识向大众逐渐普及的趋势。“力度”是音乐术语,指音乐作品表演时音响的强度,分最强、中强、渐强、中弱、更弱、最弱,由最强到中强到渐弱、最弱,力度逐渐消失。现阶段“力度”已转用于泛指许多社会现象,包含“强度”和“功力的深度”的意思。如“加大改革力度”“增强打假(指打击假冒伪劣商品)力度”。“效应”原指物理的或化学的作用所产生的效果,如“光电效应、热效应、化学效应”等;现泛指某个人物的言行或某种事物的发生、发展在社会上引起某种反响或产生某种效果,如“轰动效应、名人效应、明星效应、深圳效应”等。1993年我国因经济过热现象曾引发通货膨胀,党中央及时采取措施,狠抓金融整顿工作,不到半年时间,通货膨胀和经济发展的速度就稳定下降,化险为夷,人们借用航天术语“软着陆”去描述这种现象。“软着陆”主要指航天飞机由于采取了减速等措施,安全降落在地面。

也有一些通用词语通过比喻泛化为专用语。“内功”原指锻炼身体内部器官和内部功能的武术或气功,现泛化为企业良好的内部机制。因此,管企业建立良好的内部机制叫“练内功”。仿自“内功”出现了“外功”。“输血”指把健康人的血液输入病人体内,现泛化为从外部给企业援助。与输血相对的是造血。“造血”原指肌体自身制造血液,现泛化为企

业“依靠自己的力量,通过内部调节,保持自身的活力”。

5) 通过比喻产生新义。“婆婆”原指丈夫的母亲,在我国的传统文化里,“婆婆”附上了独断专行的文化色彩。近年来,有人管对下面瞎指挥和不明智、不民主的顶头上司叫“婆婆”,用于比喻义的“婆婆”具有新词的性质。

6) 词语褒贬色彩的变化。从前,人们认为竞争就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残酷得很;如今认为竞争可以保持活力,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吃大锅饭”是指不管干与不干,干好干坏,一律都有饭吃。过去,大锅饭在实际上被认为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表现;现在则认识到大锅饭越吃越穷,它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而需要改革。于是,出现了“砸三铁”(“三铁”指铁饭碗、铁工资、铁交椅),以及“金饭碗、泥饭碗”等新词语。新时期里某些政治色彩浓厚的词语也发生了褒贬色彩的变化(下详)。

那么,汉语新词语究竟有哪些特点呢?

第一,量多面广。一个社会如果长期封闭,其语言就会相对稳定;如果比较开放,语言的变化就会像流水一样不可遏止,我国的历史和现实都说明了这个问题。

就拿改革开放 20 年来说,中国大陆发生了巨变,反映新事物、新概念和新观念的词语层出不穷。

于根元主编的《现代汉语新词词典》(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4),收入1978—1990年的新词语3710条,后来又陆续出版了编年本《1991汉语新词语》、《1992汉语新词语》、《1993汉语新词语》、《1994汉语新词语》……约收入2000余条,词典和编年本合计收入新词语约在6000条以上,未收入或因昙花一现的词语估计也有4000余条,加起来近10000条,平均每年出现的新词语约600条,基本上反映1978—1995年内地新词语的状况。新词语涉及近20年中国内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方方面面。其中,日常生活方面的新词语源于生活,贴近大众,一直呈现着强劲的势头。例如,英国《独立报》刊载了这样一段话:“大腕最喜欢带着小蜜到卡拉OK歌舞厅参加派对,喝着杯中的XO酒,OK!”(转引1994年11月12日《参考消息》)。不到30个字,就出现了北京流行语“大腕”(指演艺圈里有影响的人物)、“小蜜”(即情妇);香港社区词“卡拉OK”“歌舞厅”和英语词“派对”(小型舞会)、“XO”(年代久远的洋酒)、“OK”(好极了)等7个新词,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内地社会生活的变化。

第二,系列化。汉字是音节文字,通常是一个字一个音素,一个语素,只要两个音节之间语义上可以搭配,事理上讲得通,符合语言结构习惯,通过仿造就可以构成系列化的双音节新词。据于根元《1991

汉语新词语》里统计,该编年本收入当年新词语 335 条,其中“仿……而来”的新词 46 条,约占全年新词语总数 14% 左右。下面是“仿造”的例子:仿自“文盲”,出现了“科盲(缺乏起码科学知识的人)、音盲、法盲、舞盲、药盲、机盲、股盲、电脑盲、外语盲、统战盲”等新词。又如从“的士”(出租小汽车)提取音译字“的”,一共仿造出一二十个“的”族新词。一方面,赋予“的”以“出租机动车”的含义,仿造出“打的、叫的、坐的、拦的、打面的、打摩的、打残的、打火的、打豪的、打夏的(指夏利汽车公司的出租车)”和“的哥、的爷、的姐”(指出租车司机)、“的票”(出租车的报销凭证);另一方面,“的”又引申出“租用非机动车”的含义,仿造出“打马的、打骆的、打板儿的(坐平板三轮车)、打驴的(骑小毛驴)”。近年来,也管坐飞机叫“坐飞的”了。

第三,新陈代谢的节奏快。汉语新词语中,尤以民间创造的新词语来得快,消失得也快。80 年代初,国门刚刚打开,新事物、新概念、新观念大量涌现,令世人眼花缭乱,兴奋异常。至于新事物的名称,人们一时还来不及深究。只要在新闻媒体一出现,民间口头上辗转流传,先就这么叫着。过了一段时间,新词语中或保存下来,或隐退,或消失,或缩小了使用范围,或被其他更新的词语所代替,呈现出下列各种现象。

(1) 由于追求新颖或其他原因而创造和使用的新词语,与老词语构成了同义关系,共存于现代汉语里。上述“打的”与“叫出租小汽车”是典型例子。又如:“新颖服装、新颖发型”的使用范围受到“新潮服装、新潮发型”的蚕食而缩小了。该用“真棒”“好极了”的地方有人用“OK!”;该用“再见”有人有“拜拜”,该用“费用分摊”,出于婉转说成“AA制”;该用“对不起”,因嫌港味不足而改用“唔好意思”。“透过多种关系”与“通过多种关系”,“联手决定”与“联合决定”,“相关法规”与“有关法规”,“生活水准”与“生活水平”,上述加黑点的双音词里,前后构成了同义关系,前者为港台语词。为了突出信息化时代的特点,人们更多地使用“信息”“难度”,较少使用“消息”“困难”。“群众观点”的说法不时髦了,听到的是“群体意识”。“美发厅”部分代替“理发店”后不久为更新的“发廊、发屋”部分代替。新词“推出”的部分功能又被“出台”所替代(如“出台了预防犯罪法”,就不宜说成“推出了预防犯罪法”)。新词的含义更能紧贴现实,因而更符合社会发展变化的需要。这几年,强调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政企分开,因而“国有企业”取代了“国营企业”,更加突出了所有制(国家所有)的性质。过去,与“正面”相对的是“反面”,它多用于政治上和文学评论上,如“反面教员”“反面人物”。这几年流行着“负面”,主要指“消极的那一

面”，如“负面影响、负面效应”，是对“反面”义的补充。新词的语气有时比较婉转。“回答、答复”常用于面对面的场合，“请你回答”“请你答复”，因柔性不足，往往会令对方尴尬；而新词“回应”一般不用于面对面的场合，当面不说“请你回应”，而是背着当事人说：“他什么时候回应呢？”因此，正式场合多用“回应”，显得语气婉转，不生硬，有礼貌。

(2) 事物的不断变化是新旧词语更替的主要原因。待业是内地计划经济年代的产物。那时候，考不上大学或上不了高中的学生，在家等待一段时间确实就会有工作安排。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今天，已经无业可待了，一旦从工作岗位上下来，一时找不到工作便是失业。由于“失业”不好听，“下岗”则多了一份柔性与婉转，比较受听，人们就管失业叫“下岗”了。当然，下岗职工还可能从原单位那里得到一份关怀，而社会上无业或失业人员是没有这份福气的。1998年后，“下岗”的使用频度不断攀升。与“下岗”有关的新词语“上岗、待岗、再就业、隐性就业、下岗待业、失业保障”等在新闻媒体上频频出现，反映从1998年起我国再就业的形势比较紧张。

传销是90年代初从境外传入我国的一种销售方式。有个时期，传销被炒得沸沸扬扬，引发出种种社会问题，扰乱经济秩序，影响了社会稳定。1998年4月，国务院明令禁止一切传销经营活动。此后，

“传销”这个词就很少出现了。

20年前,港台早已把 supermarket 译为“超级市场”了,内地却因长期以来顾客不能自选商品,所以把它译为“自选市场”。“自选市场”这个名称大约存在了 10 年时间。在顾客自选商品成为家常便饭以后,为了强调商品的档次,商家便纷纷把“自选市场”改称“超级市场”(又叫“超市”)了。

香港已在 1997 年 7 月 1 日回归了祖国。在这之前,因香港回归提到了日程上来,于是出现了“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50 年不变”“香港基本法”“预委会”“推委会”“临立会”“民建联”“直通车”“香港特首”“区徽、区旗”等新词语。其中,“直通车”在当时只是一种愿望,终究实现不了,这个新词就很快消失了;而“预委会”“推委会”“临立会”,在回归之后已完成了历史任务,也先后成为历史性词语。

(3) 出于对词语概念的慎重考虑而出现新旧词语的更换。香港回归以前,我们用“恢复行使主权”代替“收回主权”,用“政权交接”代替“主权交接”,用“英国对香港实行殖民统治”代替“香港是英国殖民地”等说法,那是事出有因的。

据了解,1971 年 11 月我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当时联合国非殖民地委员会把香港、澳门列在殖民地名单之中,1972 年 3 月我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黄华奉命致函该委员会,重申中国政府的一贯立场,

指出香港、澳门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解决香港、澳门问题完全是中国主权范围内的事,根本不属于通常的“殖民地范畴”。如果把香港、澳门看作一般殖民地,按照世界范围内殖民地走向非殖民地的模式,这些殖民地可以采取“公民自决”等方式独立出去。香港、澳门从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98%居民是中国人,中国人民从来不承认帝国主义强加给我们的不平等条约,所以不能套用“殖民地模式”。^①

(4) 在现代汉语词语中,双音节词越来越占优势,三音节词有增加的趋势,词到了四音节就达到了饱和点,再多就不容易了,常常用简缩的办法回缩到双音节的模式里去。^②“凡新词,大量的是双音节的”。^③基于对汉语音节的这种考虑,我们发现汉语新词语的变化也受到上述音节规则的制约:一方面,如果先后出现了两个同义而不同音节的新词,其中,双音节新词比四音节以上新词在使用中更容易占优势。如“电脑”与“电子计算机”,前者的派生能力远远超出后者。“电脑”可以派生出“电脑打字”“电脑

① 钱其琛:《关于香港回归的若干问题》,载《求是》1997年第1期。

② ③ 张志公、田小琳:《汉语语汇中单音节语素和多音节词的相互关系》,载《语言文字学术论文集》,知识出版社,1989年。

红娘”“电脑培训中心”和“微电脑”“现代电脑”“苹果电脑”等；而“电子计算机”已有五个音节了，派生出其他词语就很困难。所以，“电脑”是极为常用的口语词。即使三音节新词，也是逐渐为双音节新词所取代。如“大哥大”，目前改叫“手机”的现象多了起来，“寻呼机、BP机”，有人叫 call 机（写“柯机”），从 call 可以派生出“call 台”、“查 call”、“追 call”。

另一方面，四音节以上新词在使用中又常常被简缩为双音节，以致有些人还不能准确说出有的双音节新词的全称形式。如：扶贫—扶助贫困，国企—国有企业，内企—国内投资企业，外资—外商投资，纠风—纠正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农转非—农业人口转化为非农业人口。

（5）新词语有时不如老词语。80年代从香港引进“女强人”后，出于时髦，大家竞相使用。由于受世俗偏见的影响，不少人（尤其是知识女性）并不喜欢这个称呼，使用频率便大大地降低了。社会上总有一部分人不愿接受“女比男强”的现实；女强人一般只顾事业不顾家庭，常常冷落了家庭老少，特别是对丈夫可能造成一种无形的压力，让丈夫时常感到别扭。这样，家庭关系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甚至离婚。单身的女强人想找个如意郎君也是不容易的。于是，“女强人”在内地终于被冷落了，人们愿意沿用五六十年代称呼事业型的女性的